

史学新论

当代史学与社会发展

——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历史学)纪要

王泳军 任朝旺 苟 军

【提 要】中国有悠久而深厚的史学传统,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的史学都对国家的统一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当代史学也应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2009年10月28日至30日,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历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于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教授三位专家分别就“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等三个主题作了学术报告,不仅展现了专家们深厚而精湛的学术理论功底,也让与会者受益匪浅。此次会议收到83篇投稿,其中44篇入选会议论文,18篇论文分获一、二、三等奖。获奖论文对历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填补和强化了历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对历史定论和陈说有了新的看法和观点,展现了当代史学博士生较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文字驾驭能力,发掘和检阅了我国史学研究的后备力量。此次会议举办规格之高、筹备工作之完善、参与范围之广、论文质量之上乘为近年国内同类会议所少见,为全国史学专业博士生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与切磋的平台。

【关键词】当代史学 社会发展 史学功能 博士生会议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0)04-0124-10

一、本届论坛综述

2009年10月28日至30日,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承办的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历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顺利举行。

10月28日上午,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历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三楼多媒体报告厅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赵芮博士主持。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迎秋教授致开幕辞,刘院长在致辞中首先对本次会议的顺利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对来自全国各地

的历史学博士研究生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在场的史学博士研究生提出了殷切期望,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处王泳军处长宣读了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向会议发来的贺信;会议博士生代表俞贺楠同学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主席张跃同学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朱佳木教授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的主题学术演讲。28日下午,王泳军处长主持学术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沛教授作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步平教授作了《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的学术报告。28日下午和晚上及29日上午博士生共举行了四场学术交流会。交流会采取论文PPT宣讲、博士生点评、专家点评的形式,点评专

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学报编辑部主任赵俊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永攀博士。交流会上，与会博士生积极交流，踊跃发言，认真讨论，学术气氛浓郁而热烈。本次会议共收到83篇应征论文，44篇入选会议，18名同学分获一、二、三等奖。来自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50名历史学博士生参加了此次会议。10月29日下午，参加本次会议的博士生们在会议组委会的安排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观了反映我国史前先民生活面貌的文物展厅，并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了真实再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历程的大型国情主题展览——《复兴之路》。10月30日上午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赵芮博士主持。在闭幕式上，点评专家赵俊教授、获奖博士生代表发言；颁发相关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黄晓勇教授致闭幕辞，黄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向获奖同学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总结了本次博士生会议的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举办规格高，二是与我国史学界的一流学者直接对话，三是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和学术探讨。黄书记语重心长地举出“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三句话与在座的史学博士生共勉，并祝愿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二、部分获奖论文摘英

此次会议收到83篇投稿，经过初选，44篇论文入选。经过专家评定，3篇获一等奖；6篇获二等奖；9篇获三等奖；26篇获优秀奖。纵观与会论文，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一）对历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新的探索

上海大学2008级博士生崔华杰在《传教士与中国历史研究：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认为：《教务杂志》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该刊物自1867年1月创刊于福州，至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于上海，前后持续74年。除了教务内容的相关记述外，还记录了大量传教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译介和评述，其针对的读者群是在华传教士。这种面向传教士自身的刊物实质上反映的是圈内人自己在一起讨论的问题和看法……更能反映出他们真实的想法。故传教士在这种刊物上叙述较为真实和自然，给现今的研究留下相对客观的历史资料，因而具有

独特的史料价值。然而1949年以后，大陆学术界用“文化侵略”来定义传教士在华活动，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更多表现的是政治话语统帅学术研究。虽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中国大陆学者用“文化交流”和“现代化”范式来研究传教士在华活动，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诠释传教士在华的文化事业，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考察传教士在华的教育和慈善事业。但这显然是不够的，还应从中西历史的大变革中来研究外国传教士研究中国历史的背景因素，指出其中国历史研究的这个话语体系的性质。通过《教务杂志》上刊登的研究中国儒道佛三家的文章的量化分析得出其有阶段性特点。若以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分界，《教务杂志》研究中国宗教文化的文章在1911年前热衷儒家而冷落道佛两教，而1911年后则热衷佛教而冷落儒教。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除与研究客体的发展背景变化有关外，还与传教士的研究主题变化有关。以传教士为主流写作群体的《教务杂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阶段性特点，近现代中西历史的变迁影响了其写作主题和论述基调。传教士们怀有西方文化优越感，预判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在中西历史的比证中凸显出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然而在这个比证过程中，也客观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级博士生韩炯在《何为元史学》一文中认为：国内学界对于“元史学（metaphysics）”的兴趣是通过怀特的同名著作引起的。但“元史学”歧义纷呈，学界众说纷纭。理解元史学必须先理解建立在元理论研究背景下的元语言学的观念。在现代哲学中，meta+学科名称代表的高级逻辑形式兴起为元理论研究，即采用批判审视态度反思该学科的性质、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而每个学科的理论都是通过语言展现出来的，这就产生了元语言学。第一，内容上，它是系统性的学科理论的自我反思，不同于学科内具体单一理论反思，体现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和“自我建设”的渴求。第二，研究对象上，元理论是指向语言形态的理论，而不是指向现象领域的理论。以“哲学”为名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指向对语言层次的分析时，已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鉴于各种理论是以语言陈述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语言分析在元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三，元理论以形式化为方法。元理论回避具体内容，但认为形式已然渗透、沉淀到内容之中，因而，形式之中实则蕴含具体内容。该文认为Metahistory（元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具有类似“形而上学”特征纯粹的思辨性的历史学，即通常所说的历史哲学，但未必是具有已成体系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此种用法多含有

贬义；第二，以历史发展的动力、进程为研究对象，旨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模式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对，或称为狭义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有时又用来既指“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又指向狭义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第三，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性质及历史意义，是元理论思潮深入到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显现，类似于后来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怀特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在国内学界引起较大的争论，有三种观点：第一，认为“元史学”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第二，认为“元史学”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它不同于以往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可归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第三，持一种模棱两可的看法。作者认为，要正确认识“元史学”的本质，必须搞清楚怀特“元史学”产生的历史哲学背景、特定的撰述环境、怀特本人对待“元史学”的态度。理解怀特的“元史学”要义有两个层面：一是怀特的元史学研究是否能够更好地维护历史实在；二是怀特是否要倡导一种元史学的方法。作者最后指出，元史学本意是指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元史学研究，以分析哲学推动下兴起的元理论研究为宏观背景。元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历史学学科性质的反思，当这种反思指向历史学的专门术语如历史规律、历史解释、历史事实、历史描述等学术语言时，其表现形态就是“分析的历史哲学”。而当怀特把反思对象指向历史学的“日常有教养的语言”，并结合法国学者巴尔特、利奥塔等人的文法理论，联系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态度、意图和语言的具体功能、效用，对具体的语言用法（限于英语用法）加以分析和分类，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历史研究都包含有元史学的要素，即作为一种深层次结构的转义模式。怀特的元史学研究是对于历史文本的元语言学式的理解，他无意于探究作为初级指涉的历史现象本身。元史学研究保留了“元史学”用语上的中性色彩，重新肯定历史研究者在书写过去时有的能动性，其理论成就的表现形态就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元史学》命名其著作是作者反讽意图的表现。

（二）填补和强化了历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北京大学2008级博士生陈昱良在《禁酒令实施与清高宗初政》一文中认为：乾隆初年，弘历颁行的禁酒令引发了廷臣及督抚对禁酒问题的广泛讨论，并且确立了相当严厉的禁酒制度。但是学界目前关于乾隆朝的禁酒令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王纲的《清代禁酒策论》、范金民的《清代禁酒禁曲的考察》、李富忠《清乾隆初年禁酒史考探》等。这些论文主要使用已经公开发表的

材料，以讨论禁酒令本身的得失或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禁酒令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为主。而学者讨论清高宗的治国思想、统治手段以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时，则很少提到禁酒令相关问题。如高翔的《康熙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和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等重要著作都没有专门关注禁酒令的议定与施行情况。该文认为，虽然禁令最终流于空文，然而君臣之间如此大规模地论证和实施禁酒之政，在清朝和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禁酒令与清高宗的重民执政理念有关。乾隆初年直隶山东旱灾乏食，高宗首次下旨将禁酒由临时之策转为常年之法。此后数年，皇帝与廷臣督抚不断讨论，对禁酒令做了很大改变。所禁之物从烧锅到酒曲，后来还包括了南方的其他酒种；其范围从受灾之地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其性质由国家颁谕的法令，逐渐转为地方官劝化之内容。高宗在即位后数年间一直坚持推行禁酒令，实际上在树立新君、加强君主统治权威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从乾隆初年的禁酒令的颁布与施行看出清高宗的治国思想、统治手段及变化的轨迹。作者认为禁酒令的颁布与施行体现了清高宗治国理念从理想趋于现实、从“法治”到“人治”的两个转变。该文进一步指出，终乾隆之世，对于如何更好地驾驭官僚系统，以深入贯彻皇权对社会的影响，高宗并没有找到比“治人”更好的解决途径，对于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官员的陋习，他也只能通过勤政和劝告来解决“治人”之政中的种种问题，而这些方式亦随高宗晚年的个人懈怠而走向衰落。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欧阳贞诚在《美国当代外来移民的特征及成因分析》一文中认为：自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迎来了一个新的移民高峰期。新移民潮规模巨大，而且在地域来源、群体族别、教育技能、居住分布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这些新的现象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国外学者和相关机构关于美国新移民特征的研究颇为丰富且较为深刻、全面，而国内学者虽有介绍，但总的看来，这些成果多是对新移民的外在特征进行简要归纳，缺乏深层次的分析。该文指出，从数量上看，新移民潮规模巨大，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历次移民高峰；从来源地上来看，新移民潮发生了由欧洲向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洲际转移。这次移民潮伴随了两种现象：一是通过非法入境和合法入境但逾期不归的非法移民；二是“外迁移民”问题。这次移民潮具有多样化、两极化、集中化和分散化四个特征。这次移民潮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美国政府制定的移民政策，特别是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密切相关；二是经济因素仍是美国新移民潮得以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三是移民输出

地的战乱与政局动荡等不安定因素，也直接促成大量移民涌进美国；四是移民网络以及移民文化的存在，是维系移民潮长期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

天津师范大学 2008 级博士生姚远在《试析 17 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社团法人的自治权利》一文中认为：英国皇家学会是英国近代产生的第一个科学研究社团。它植根于 17 世纪欧洲科学思潮的兴起，在伦敦知识分子群体自我组织意识觉醒的条件下最终形成。皇家学会的早期活动开始于 17 世纪 40 年代内战时期的伦敦，于 1660 年正式成立，并凭借查理二世授予的 1662 年、1663 年、1669 年三个特许状最终获得社团法人地位，被英国法律所认可。此后，它成为 17 世纪英国科学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传播的重要基地，也成为 18 世纪英国启蒙运动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该文接着指出，通过 1662 年和 1663 年国王的两个特许状获得了“使用统一名称和保持永不中断的成员更替”两项基本权利，成为皇家学会社团法人其他衍生权利与特权的基础。使用统一名称标志皇家学会获得社团法人资格，保持永不中断的成员更替保证了法人在社会上发挥持续的行为能力，促使法人完成建立之初的宗旨和目的。除了这些基本权利外，皇家学会还拥有一些诸如购买、让渡、接受捐赠、自由权、特权、管辖权及财产继承权所有权，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自行制定章程或内部条例的权力等保障社团法人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法律领域的具体权利。这些权利成为自治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柱。此外，皇家学会还拥有印刷出版、解剖、学术交流等被赋予权威和全权等有利于科学活动的特权。该文最后指出依据特许状和普通法中规定的自治法人权利，英国在知识生产领域逐渐走向了民间自治的道路，也为民间科学组织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三）对历史定论和陈说有了新的看法和观点

安徽师范大学 2007 级博士生刘俊男在《原文化意义上的三皇五帝考论》一文中认为：在上古中国，上层统治者有一以贯之的对五天帝与五人帝，或者再扩大到对天、人二系统的“三皇五帝”的崇拜及祭祀。天、地、人对应可谓上古中国天人合一的核心理论，属圣人哲学，是诸子百家共同重视的重大学术理论。但顾颉刚等疑古学者曾因不理解“三正五行”的学术，分不清天帝与人帝，而将包含“五行”思想的古文献甚至整个“五帝”时代一概否定，实不可取。通过考证《周礼》等古文献，三皇五帝中的皇、帝的本义皆与神鸟凤凰（天翟）有关，其本义皆指天帝，或天帝之使者。刘俊男也认为上古所谓“三正五行”是古代历法的最基本理论，“三正”指天正、地正、人正，即以天、地、人为参照物而确定年首的司历方法，“五行”指木、火、土、

金、水五个季节，每节 72 天，余 5 至 6 天为过年。古人认为每个节皆有一位上帝主宰着，这五帝即东方太昊帝、南方炎帝、中黄帝、西方少昊帝、北方颛顼帝。所谓东、南、中、西、北指春、夏、季夏、秋、冬五节。春秋时期，后人将前后不同时代的五圣君或将五方君主比附五天帝，故上古五帝有天人两套系统。“三皇五帝”原本指“三正五行”，三皇比附三正有黑白赤三色，五帝比附五行有青赤黄白黑五色。人间三王五帝可与五行相比附，新一代圣王去世，三王五帝便往前推一位，最前一位便升为“九皇”（即从三王、五帝往上算第九位），“九皇”可比附九人，再往前则变成“六十四民”，所以三皇五帝之说纷纭原因在于此。最后他强调虽然五行学术已淡出人们的思想，但它是上古中国的重大学术思想，不能简单地以科学、非科学来做出评判。了解这套学术就如同掌握了打开上古思想学术的一把钥匙。应树立变动的观念，不要将人帝与历法理论中的五天帝相混，不断学习司马迁的治学精神，深入古代神人相比附的时代，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古人内心世界之真谛。

苏州大学 2008 级博士生李海涛在《李鸿章与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研究》一文中认为：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领军人物，在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李鸿章对发展钢铁的必要性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这些认识包括：1. 为军事工业提供原料保障，减少外部依赖，建立“自强根本”；2. 降低军事生产成本，为提高兵器生产水平奠定基础；3. 作为发展铁路交通运输事业的起点；4. 减少钢铁进口，寻求富国裕民。这些认识在形成时间上较早，大约在 19 世纪 70 年代；内容较为系统，兼顾钢铁工业的军事及民用功能；在倡议力度上，并非蜻蜓点水，而是深入经济生产的诸多方面，贯穿整个 19 世纪 70 年代。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李鸿章开始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早期实践。这些实践包括：1. 督饬相关兵工企业积极试办；2. 成立煤矿开发企业；3. 鼓励相关督抚主动开矿炼铁；4. 努力为钢铁工业建设营造较好的外部环境。虽然这些实践效果不佳，但中国要走向富强，钢铁工业的诞生、发展和壮大将是历史的必然。该文最后指出历史是阶段接力赛跑，中国钢铁工业从诞生到现在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至上世纪末，中国成为世界头号钢铁大国，并正在向钢铁强国迈进。100 多年来，无数志士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钢铁工业建设挥汗洒血，方成就今日辉煌。恰如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追寻这百年发展历程，必须从李鸿章开始，作为第一棒起跑者，虽然其实践成效不佳，但其创议之功不应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级博士生徐峰在《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看傅斯年的古史重建》一文中认为:1928年,傅斯年先生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并开宗明义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长期以来,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提法备受争议,一些学者对之过于贬损,并未心平气和地理解傅斯年的这句话。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风起云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等接踵而至。各个领域都正经历着新旧交替。史学领域也不例外。中国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统在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中被摧垮。傅斯年为超越顾颉刚的理论便做了独辟蹊径的史学研究,开始了对古史的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重建”绝不仅仅停留在被疑古派摧垮的古史这一层面上,而是要广远得多,是要搜尽一切可用的材料来重建古代世界。傅斯年的重建,主要是在扩充材料、用尽材料的基础上建设出一个比传统史学范畴更广阔的史学。傅对材料的态度是慎重、客观、实证。原始时期的研究、基本取向当与史前史类同。归根结底,人为的研究取向仍是因了材料的性质而对待材料,研究者要做的,仍不出扩张和审慎科学对待两途。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个中深意正在于此,而它曾几何时一度被讥为“材料主义”,实在是很冤枉的。傅斯年的古史重建并非旨在重建传统的古史,而是广远得多。傅以扩充材料、扩充研究的工具作为基本的方法,以审慎、客观、实证作为对待材料的态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态度仍是我们在今天的研究中应当坚持的。

三、专家学术报告内容概要

此次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于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学术报告。

(一)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朱佳木教授在报告中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当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研究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开始的。制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过程相当于是一次高层集体研究当代史的过程,为此后的当代史研究开了好头,指明了正确方向。接着,中央组织了十多万学者和干部,历经十余年,编辑出版了大型图书《当代中国》。这套丛书和陆续公布出版的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重要文献选编,以及包括党和国家

领导人文选、文集、文稿、传记、年谱、日记、回忆录在内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当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1990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专事编纂和研究当代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该所创办了《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主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并于2001年起开始编纂编年性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至今已出版1949年卷至1955年卷;同时建立了面向全国征文的学术年会制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创办了国史系。中央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也纷纷建立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当代史研究机构,部分高校还开设了当代史课程,设立了以当代史为专业方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这些机构和专业的设立,以及不断涌现的专门人才和编研成果,为当代史研究登上学术舞台提供了必要前提。

接下来,朱佳木教授重点阐述了什么是中国当代史,当代史如何分期,当代史有几条主线,怎样看待当代史的主流,以及当代史有哪些学科特点等五个问题。

关于什么是中国当代史?

朱佳木教授认为,要给中国当代史下一个学科定义,需要弄清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当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的关系,二是中国当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关系,三是中国当代史与中共党史的关系。

关于中国当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关系,朱佳木教授认为,从时间上讲,当代史和国史的上限都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然而从空间上讲,情况则稍有不同。在一般意义或政治意义上,国史等同于当代史。但在学术意义上,国史有时与当代史相重合,有时则只包括中央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历史而不包括暂时不在中央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历史,或者只包括国家宏观的历史而不包括地方史和部门史。当代史是否等于国史,关键看使用国史的概念。通常情况下,当代史的概念比国史概念在空间上更为宽泛。

关于中国当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关系,朱佳木教授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主要应当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应当统一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由原来的1919年改为1949年,将中国现代史的上限由原来的1919年推迟至1949年。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国史的概念是一致的,可以称“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中国当代史”或“国史”。但不管叫什么,都应当把中国现代史从现有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中独立出来,取消“中国近现代史”这个提法。

关于中国当代史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朱佳木教授认为,党史是当代史的核心,对当代史的研究和对党在建

国后历史的研究难免会有内容上的交叉、理论上的相近。但是，当代史与党史毕竟分属于史学和政治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即使从史学角度说，当代史是通史，而党史是专史，因此，在编研角度、范围、重点、理论与方法上都不同。从研究角度看，党史是执政党的历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如何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国家的意志，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国外政党的交往，如何进行自身建设等等。而当代史研究角度则是整个国家的历史，研究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各项行政制度、法律法规如何制定修订，以及各参政党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从研究范围看，党史研究的范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而当代史研究则侧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当代史研究的范围比党史大。从研究重点看，党史研究的重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以及党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状况等。而当代史研究的重点则是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和行政制度、人事制度的建立与改革，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等等。从研究的方法看，党史和当代史研究除了要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外，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的有益方法，都要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然而，党史研究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并多研究一些以往历史中没有遇到过的特殊问题，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而当代史研究作为史学分支学科，则应当基本运用史学的方法，多研究一些与以往历史和别国历史间的共性问题。

概括起来，朱佳木教授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自然延伸。

关于中国当代史如何分期？

朱佳木教授介绍了当前学界对当代史的五种分期方法，即

二分法：1949 年—1978 年，1978 年—

四分法：1949 年—1956 年，1956 年—1966 年，1966 年—1976 年，1976 年—

五分法：1949 年—1953 年，1953 年—1956 年，1956 年—1966 年，1966 年—1976 年，1976 年—

六分法：1949 年—1953 年，1953 年—1956 年，1956 年—1966 年，1966 年—1976 年，1976 年—1978 年，1978 年—

八分法：1949 年—1953 年，1953 年—1956 年，1956 年—1966 年，1966 年—1976 年，1976 年—1978 年，1978 年—1992 年，1992 年—2003 年，2003 年—

朱佳木教授认为，以上各种分期都有一定道理，但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当代史的特点，他本人倾向于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角度来划分历史时期，并主张将 1949 年至今的当代史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1) 1949 年—1956 年。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

(2) 1956 年—1978 年。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突破苏联模式，试图用计划经济体制加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

(3) 1978 年—1992 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经济体制内，采用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的时期。

(4) 1992 年—2003 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确定建立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5) 2003 年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的科学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的时期。

关于当代史有几条主线？

朱佳木教授认为要回答当代史的主线有几条的问题，关键看从哪个意义上理解“历史主线”。如果从历史发展基本动力、最终根源，或者从历史发展本质特征的意义上来理解历史主线，主线只能有一条。但如果从历史发展内在动因的意义上来理解历史主线，则主线不一定只有一条，很可能是多条。因为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是历史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主体的目的往往有很多，其中必定会有几个是贯穿和左右特定历史全部过程的。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贯穿这一特定历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1)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2) 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3) 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新中国 60 年的历史说明，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都受新中国的性质和国情所决定，都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愿望之所在，都在中国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下支配和左右着中国当代史的发展。当代史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答案。抓住了这三条主线，也就抓住了中国当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脉络，而且可以大致预测出新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关于当代史的主流是什么？

朱佳木教授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特别是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失误和错误,必须树立四个观点:一是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比较。二是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即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不能把个别、局部的错误夸大为普遍、全局的错误;对整体上失误和错误的事件也要分析,看其中有无正确和合理的成分,不能以偏概全,把其中正确和合理的地方也说成是错误;分析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把二者加以区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三是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区分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是难以避免的。四是在分析当时条件下可以避免的失误和错误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朱佳木教授指出,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主流,除了要正确分析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外,还要看到那30年对改革开放的意义,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相互联系。改革开放前30年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可以从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利的国际条件,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等方面来看。他强调,改革开放不是在1949年前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and 旧中国留下的那个满目疮痍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新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近30年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与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将难以为继,但没有前3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难以起步。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相比,前30年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前30年的成就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

关于当代史学科有哪些特点?

朱佳木教授认为,当代史学科具有较大的学科交叉性,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突出的现实性等四个特点。

(1) 较大的学科交叉性。朱佳木教授认为,史学本来就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学科,它不仅要运用史学的方法,也要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而且,经济历史学、地理历史学等等史学的分支学科,与经济学、地理学等等学科中有关历史研究的分支学科,也难免会有交叉。但这些综合性、交叉性,都不如中国当代史研究这么大。这除了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中国当代史本身呈现出比以往历史更大的

多样性、融合性外,还因为中国当代的历史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因此,其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也会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一级学科的分支学科。

(2) 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朱佳木教授认为,包括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门学科,无不具有意识形态性。只不过由于当代史研究的对象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其意识形态性显得更为强烈些罢了。所谓学术研究要“价值判断中立”,要“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要“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的主张,不过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幻想。另一方面,说当代史研究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绝不是要否定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强弱,而在于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学术规范。

(3) 强烈的政治性。朱佳木教授认为,既然“去人之史”可以“灭人之国”,反过来说,“卫己之史”也可以“护己之国”。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史学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也具有“护国”的功能。他强调,对国家史的解释,历来是各个阶级及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较量的重要领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因此,当代史研究比起史学其他学科,与国家兴亡、政权安危的关系更密切,更直接,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性。对此,我们应自觉地发挥当代史研究的“护国”功能。这与史学研究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尤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也是相互吻合的。

(4) 突出的现实性。朱佳木教授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不同的是今天的当代人写当代史不仅有比历史上的“当代人”更优越的条件,而且有了了解当代史、参与当代史撰写的强烈愿望和兴趣。要求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国家史究竟应当由私人写,还是由国家机构主持写,不仅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有关,也和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当代史书能否做到客观公正,关键在于由当代人写还是由后人写、由国家机构写还是由学者个人写。对“客观公正”理解不同,“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也会不同。编纂或研究当代史的唯一标准是尊重客观事实,力求符合

历史的本来面貌。

最后，朱佳木教授着重指出，任何学科要想最终作为一门科学而立足，都需要有自己合乎客观规律的、独立完整系统的学科理论。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长期的奋斗。但只要有当代史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当代史的学科理论一定会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当代史的学科体系也一定会最终建立起来。

（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①

于沛教授在报告中，以介绍国外学者的著作观点及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时下热烈讨论的“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他指出中国史学最大的特点或最好的优点就是史学的发展和中国的命运相结合，历史学的永恒主题和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富强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应该始终和中国的独立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为了科学地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并且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教授批评了时下一些错误的历史观，并针对错误的历史观强调了两个问题：

第一，历史观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于教授指出，研究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历史标准和历史思维。在全球化更加突出、更加强化的时代条件下，作为历史研究者更加不能放弃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武器。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够真正把握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在当代中国、当代世界一系列问题之上去研究历史，而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

第二，今天的世界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多元性的世界。于教授着重指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新中国各个高等院校的博士研究生，必须有自己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绝对不是照搬照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恰恰是最反对用这种办法的。

于教授最后着重指出，既然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观，而历史观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就要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指导研究。这并非政治说教和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道违背。他引用两句比较有名的话来说明这一问题并结束了报告：一句是古希腊的——“历史学的功能或者引向天堂，或者引向地狱”；另一句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的，“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就是为现实，而不是过去。”

（三）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②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教授在其报告中介绍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来龙去脉；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作为历史学者的思考三个问题。

1.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来龙去脉。步平教授指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战后初期，50、60、70一直到80年代初期，一直存在历史问题，但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突出。冷战结束之后，90年代初期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冷战之后历史问题反而突出了？

步平教授认为这和中日结构变化相关。从日本方面来看，中国近代学日本，形成了日本习惯于从上向下来看中国这个模式。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差距急剧缩短。然而，日本从90年代中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到目前，中日之间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化，这样就导致了双方的认识变化。因为过去中国落后，现在却需要抬起眼睛看。这种心理导致了日本焦虑的感觉，由优越感到焦虑感，这种状态表现在历史问题上就比较突出了。而中国从一个弱国到大国，中国的视野不断放宽。这种变化也引起了中国心理状况的变化。中日逐渐成为竞争对手和中国从被侵略的弱国成为大国强国的变化比较突出表现在日本一些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大多是否定侵略，这就导致中日关系的僵化。步平教授介绍到，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之后，中日达成了一个共识，双方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加强两国学者的交流。根据这个共识，两国的外交部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双方各选出10名学者组成一个委员会，这10名学者分成两组研究古代和近代两部分。步平和北冈伸一分别是中日的首席委员。中日双方确定了如下共同题目：

第一卷（古代史）由总论与三部六章构成：

总论

第一部 东亚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变革

第一章 七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创立

第二章 十五至十六世纪东亚国际秩序与中日关系

第二部 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的诸形态

第一章 思想·宗教的传播与变化

第二章 人与物的移动

第三部 中日社会的相互认识与历史特质的比较

① 本小节内容根据于沛教授的讲话录音稿整理而成，整理后未经本人审阅。

② 本小节内容根据步平教授的讲话录音稿整理而成，整理后未经本人审阅。

第一章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相互认识

第二章 中日政治社会构造的比较

第二卷（近代史）由三部九章构成：

共同报告

第一部 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及演变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

第二章 对立与协调：走上不同道路的日中两国

第三章 日本向大陆的扩张政策与中国国民革命

运动

第二部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到中日战争的爆发

第二章 中日战争——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抗战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中的中日战争

第三部 战后中日关系的重建与发展

第一章 从结束战争到中日邦交正常化

第二章 新时期的日中关系

第三章 历史认识与历史教育问题

步平教授作了进一步阐述：古代主要选择几个视角，每个视角选择一段时间。双方想通过这种方式尽量把双方观点反映出来。所以把近代划为1840年到现在，中间以战争为界。“9.18事变”之前是第一个时期，“9.18事变”之后作为第二个时期，战后到现在作为第三个时期，加起来是16篇文章。双方各自16篇，加起来32篇。特别是近代，每个题目下面，双方都确立了十个左右关键词，这十个左右问题，双方都要写到，谁都不要回避。步教授介绍说著作已经完成，即将出版。

2.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话空间。步平教授介绍说，中日双方共同的历史研究对话空间存在三个差异：政治层面——关于侵略战争的性质判定；感情层面——不对称的历史体验；学术层面——研究方法。

(1) 从政治层面来看，日本人认罪与否？反省与否？步平教授认为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07年胡锦涛主席到日本访问及日本作的表态来看，日本已经反省与认罪。

(2) 从感情层面来看。步平教授认为中国方面是受伤害比较多；日本方面的态度包括反省和翻案。

反省：《旧金山和约》第11条：“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期间表态；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谈话。

翻案：1956年“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对“自虐”的攻击；80年代中“战后40年政治总清算”，“东京审

判史观”；90年代中“自由主义史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扶桑社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步平教授也用中、日、韩三国学生历史认识的不对称说明了三国感情层面上的差异。

三国学生历史认识的不对称

中国学生	日本学生	韩国学生
南京大屠杀	原爆	殖民地支配
731部队	东京大空袭	从军慰安妇
三光作战	冲绳作战	创氏改名
中国——被害 日本——加害 侵略	日本——被害	韩国——被害 日本——加害 殖民支配

步平教授强调，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加害”意识，一直强调被害。但事实是日本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加害者。如果日本没有这种认识，很难取得被害国的共识的。日本人的加害意识太单薄的主观原因是日本社会没有为加害意识提供环境，这需要沟通来解决民众感情层面上的认识。

(3) 从学术层面来看。步平教授介绍中日双方的近代历史差异，并用中日两国的近代史来说明认识的不同

日本近代史

佩理黑船（1856）——尊王攘夷——明治维新（1868）——甲午、日俄战争——等强国（1905）——九一八事变（1931）——亚洲太平洋战争（1941）——战败、民主改革（1945）——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近代史

鸦片战争—抗英—开国（1840）——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中法战争（1884）——甲午战争（1894）——洋务运动戊戌变法（1898）——义和团八国联军（1900）——辛亥革命（1911）——二十一条（1915）——五四运动（1919）——满洲事变（1931）——中日战争（1937—1945）——新中国建立（1949）——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1978）

步教授进一步指出：1937年到1945年，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叫抗日战争，而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把战争分成了几个阶段：日本——中国（侵略战争）；日本——美国（解放战争）；日本——苏联（被侵略）。中国人研究历史喜欢“厚古薄今”，而日本人则喜欢“薄古厚今”。

3. 作为历史学者的思考。步平教授指出政治、民众情感、学术这三个层面非常复杂交错在一起。作为历史学者应该考虑，解决多面的问题，不能单一，不可能要

求双方一下子完全改变，不可能一种声音；作为历史学者应该思考历史认识能否跨越国境；关于历史认识的挑战；对共同研究的批评；对共同研究的怀疑；共同研究在学术层面解决什么问题。

步平教授认为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仅了解自己，还要了解对方。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认识世界，从中国到世界，从世界到中国。

致谢：在本文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的具体指导，也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跃、吴撼地、顾世宝、马献忠等同学的大力帮助，需要

特别提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于玉蓉同学，她在会议现场的录音及会后录音稿的整理工作中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文作者：王泳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处处长

任朝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 2006 级博士生

苟 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 2009 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 俊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mmarization on 2009 National Ph·D·Candidates' Conference (Historiography)

Wang Yongjun Ren Zhaowang Gou Jun

Editor's Note: China has a long and strong tradition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made its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te's reunification and stability, and promoted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history not only inherited the glorious tradition, but is bound to carry forward this tradition. The National Ph·D·Candidates' Conference (Historiography) was held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28th to 30th, Oct, 2009. Three experts, Professor Zhu Jiamu, one of the Party Members and Vice-Presid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ofessor Yu Pei,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and Professor Bu Pi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CASS made splendid academic speech and conducted a perceptive and insightful interpretations on thre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concerned by Academic circle, which are *Several Theoretical Issue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Under Global Vision of China Road*, *Thinking on the Sino-Japanese Joint Historical Research* at the meeting. They not only demonstrate a profound and superb academic foundation, but also allow participants to understand too much in a sudden. Meeting received 83 submissions, and 44 were selected into conference papers, and 18 papers were granted first, second and third prizes. Award-winning paper made a more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of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new methods, filling and reinforcing the weaknesses and blank of history studies and point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views on history findings and old views, not only demonstrating PH·D doctorate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solid academic foundation and skillful writing ability, but also exploring and reviewing China's reserve force of the historical studies. The conference is high-level, extensively-attended, well-organized and the meeting papers are excellent. This situation has rarely occurred in recent years and building a platform for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The successful convening of this meeting will contribute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our national theoretical study of histor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iography function; Ph·D·candidates' conference